



*John Stuart Mill's Political Philosophy:
Balancing Freedom and the Collective Good*

密尔的政治哲学

〔美〕约翰·菲茨帕特里克 著

万绍红 译

政治哲学译丛

韩震 主编



人
民
出
版
社

政治哲学译丛

韩震 主编



*John Stuart Mill's Political Philosophy:
Balancing Freedom and the Collective Good*
密尔的政治哲学

〔美〕约翰·菲茨帕特里克 著

万绍红 译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钟金铃
版式设计:程凤琴
封面设计:田杰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密尔的政治哲学/[美]约翰·菲茨帕特里克 著;万绍红 译.

(政治哲学译丛/韩震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

ISBN 978-7-01-013572-4

I. ①密… II. ①菲…②万… III. ①密尔,J.S.(1806~1873)-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B56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6337 号

John Stuart Mill's Political Philosophy: Balancing Freedom and the Collective Good

John R. Fitzpatrick

© John R. Fitzpatrick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9-5278

密尔的政治哲学

MIER DE ZHENGZHI ZHIXUE

[美]约翰·菲茨帕特里克 著 万绍红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1.5

字数:18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3572-4 定价:2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总 序

韩 震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文明、公共治理和社会建设越来越受到关注。因此，政治哲学已经成为哲学研究中最突出、最活跃的部分。

—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双重冲击下，政治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的相互渗透、碰撞、冲突借鉴和融合，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和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闭关锁国的保守策略显然既是不合时宜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在当今世界，经济联系、文化沟通、思想传播和信息流通本身早就成为生产发展的必要条件。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的意义上，它们本身就是现实生产力的组成部分：不仅生产力需要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实现，而且一定的关系、联系本身就构成生产力的要素。在这种意义上说，限制国际贸易、思想交流和信息流通就是限制生产力的发展。为了享受火，不得不忍受烟。

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国际之间的对话显然是解决国际问题的必需途径，因为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对许多问题产生不同的看法，应该进行多方面的对话。但是，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我们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上完全放任自流也是不可取的，我们必须在与世界各种政治话语的对话中凝练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先进也更有吸引力的民主、公正、和谐的价值理念），发展我们的基本观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坚持我们的基本立场（建设一个民主、富裕、文明和强大的现代化中国），而不至于使我们的航船迷失方向。

与此同时，信息流通也推动着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从长远看，文化的交流会促进我们自身文化的健康发展。但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打交道时，往往借助它们的经济优势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政策，而不是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所以，我们在进行思想和文化交流时，也必须注意我们的文化安全问题。可以说，我们是借助波涛行船，但要避免被浪涛吞没。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之水，也是既能载舟，也能覆舟。经济、文化和信息流通的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逃避是不可能的，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急流勇进，在思想文化和学术创新的竞争中发展自己。

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会扩大交往，达成共识，形成近似的时代风格；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和政治文化的趋同，因为经济的全球联系恰恰造成国际分工，而分工又必然造成利益差异和认识角度的差异，利益差异和认识差异就会造成政治的多极化和文化风格的多样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古代相近的自然经济造成古代各民族相同的文化特性，古代的差异往往是因为地理差异和缺乏交往而形成的；而现代生产的国际分工反而有可能真正促进民族文化风格的分化，因为现代社会是在交往和交流中形成的真正文化精神上的差异。

世界处于大变革的时代，人类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思想和政治上的引导！”^①在全球竞争的激流中，谁有清醒的政治理念和战略思想，谁能够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

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自己，就必须捍卫我们的主权，维护我们的政治安全。但是，要在政治上获得主动权，就必须加强对世界政治及其

^① 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2 页。

理论意识形态的研究。由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目前仍然处于强势地位，它们的政治与文化具有比较强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因此我们更应该加强对西方政治的研究。就我们哲学工作者来说，应该更多地研究西方的政治哲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容易理解对方，又能够掌握主动。

如果我们要在政治意识形态的竞争中站稳脚跟，首先就要了解对手，为此，就要加强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与对方平等对话，你就要真正了解对方的优势和局限性。只有真正认识了对方，才能找到发展自己并超越他人设置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的藩篱的方法。这就像航海，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如何才能把稳船舵，顺利达到目的地呢？答案就是：了解航程中所必要的一切信息，如海洋气象、洋流变化、航线方位等等。只有对各种险恶的条件做了充分准备，我们才可能乘风破浪，胜利地达到彼岸。

第二，要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竞争中取得优势，还必须善于从对方吸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善于学习对手，才能超越对手。我们不能因差别和对立毒化了自己的理智，丧失了从别人那里学习长处的能力。政治制度是为一定生产方式服务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生产关系的性质必然反映在政治等社会形式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不同的，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两种生产关系目前都与基本同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社会主义不能在真空中发展，它与资本主义同处一个地球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二者面对的是同一个生活世界，它们是对当今世界发展道路的两种不同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某些形式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而且，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个世纪的发展，积累了许多社会治理的经验，西方政治哲学就是这些经验的结晶。只有善于从中学习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的政治理论才可能成熟起来，并得到迅速发展。因此，我们应当加强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借鉴他们的经验教训，以使自己少走一些弯路。

第三，加强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也是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水平的战略需要。历史经验表明，文化发展和学术创新是在冲撞、竞

争、交流和融会过程中进行的。政治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治活动本身实质上就是协调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至少在现代民主政治生活中，讨论、对话和妥协是政治活动正常进行（而不是被强权与暴力所打断）的必要手段。积极地进入对话与讨论，可以在政治斗争中锻炼自己，减少自己的任意性。因此，对话、辩驳和讨论不只是一个政治活动的手段，也是文化健康发展和学术研究的必要途径。在一个鸦雀无声的社会中，思想理论和政治文化是无法得到健康发展的。为了我们的政治文化有一个健康发展环境，我们就应当自觉地、主动地投身于全球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竞争性讨论中去。

我们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新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战略研究。“倘若仍采用老的战略来对付新现实，那么新现实亦会迅速复归于老的形态之中，我们就会错过取得进步的机会。”^①而要研究新战略，就必须了解世界各国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哲学的动态。显然，研究西方政治哲学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我们建设现代化文明社会也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三

当前，西方政治哲学有五大流派：自由主义（像罗尔斯、德沃金等人）、保守主义（如诺齐克、布坎南等人）、新左派（形形色色的左派人士）、社群主义（如查尔斯·泰勒、桑德尔、瓦尔策等人）和女权主义（如苏珊·奥金等人）。这五大流派围绕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个体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地位、自由与平等、正义与美德、性别角色等问题所展开的论争，构成了当代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政治话语的主要内容。这五个流派的阵营并不像概念的分类那样截然分明，它们之间是相互渗透的。例如，在思想右倾的保守主义者中间，有的主张极端个人自由的观点，有的则主张有条件的政府控制。在社群主义中既有维护传统道德和既定社会秩序的保守主义者，也有激烈批判个人主义的消极后果，力图使公共利益占居社

^① 恩斯特·奥托·岑皮尔：《变革中的世界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会话语主导地位的新左派。同样，新左派也是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激进女权主义和种种另类思想的集合，没有统一的目标和理论指向。

首先，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上，个人与社会谁是更重要的存在，不同的政治哲学得出了极为不同的结论。传统自由主义者主张，个人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优先于社会。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先天地具有自足的、独一无二的人格，因此，人人都有着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社会在存在上依赖个人的存在。社会既没有思考的大脑，也没有行动的双手，更没有多情的心灵。任何时候，都是个人在思考，在活动，在合作，在竞争，在爱，在恨。但是，社群主义和部分新左派认为，单个的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政治社会中的人，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文化地域中形成的。人们生来带有民族的、文化的、时代的特征，人的角色首先是社会成员的身份（membership），“没有成员的身份，人就缺少有规定性的人格”^①。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语境中，才能理解个体的人格。

其次，就个体权利（the individual rights）还是公共利益（the common goods）优先的问题，不同的派别也进行着激烈的论争。自由主义和部分保守主义者往往坚持个人权利至高无上的地位，反对以任何整体社会的利益抑制或减少个人的自由权利。不过，自由主义者更关注个人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保守主义者关心的是个人的经济权利，在社会道德方面他们也倡导以社会规范对个人自由进行一定的限制。但是，社群主义者和部分新左派则认为，既然人格是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形成的，群体在存在上高于个体价值，因此个人权利在地位上就应该服从群体的共同利益。就如桑德尔所说的：“我们对家庭、社区、阶级、国家的责任重于特殊的个人”^②。

再次，正义和美德的争论的关键在于，秩序良好的社会依赖的是理想

① Michael Walzer, “Membership”, in *Communitarianism and Individu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65.

② Michael Sandel, “Justice and the Moral Subject”, in Markete Daly ed., *Communitarianism: A New Public Ethics*, Bel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p.84.

的政治建构模式，还是依赖世代筛选和凝练形成的文化传统。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认为，按照某种普遍的理论 and 制度安排，可以建立自由和正义的社会。因此，政治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建构具有普遍适应性的正义制度。但是，社群主义者认为，政治判断从来都是在政治实践之中作出的，而我们的政治实践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中展开的，因而制度和模式与其说是理论上的建构，不如说是传统的演化和政治实践的结晶，良好的政治运行需要富于传统根基的行为德性。

最后，女权主义向传统的政治哲学的图景提出挑战，认为以往的政治理论“只关注男性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和公共政治领域”^①，忽视了日常生活和私生活领域的政治问题。按照传统的政治理论图景：左派主张平等，因此往往赞同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右派认可自由，因而倾心于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在中间是一些自由派（liberals），他们相信某种自由与平等的鸡尾酒式的混合类型，因此主张福利国家形式的资本主义。女权主义认为，传统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在讨论自由、平等和公正等问题时，都忽略了两性之间的自由与公正和性别平等问题。女权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把两性之间的关系带到政治话语争论的前台，成为政治论争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我们这套丛书准备持续地进行下去，既译介一些西方政治哲学家的代表作，也译介某些对这些政治哲学代表人物的理论有深度的研究性著作，力求给读者了解国外的政治哲学的发展提供方便，以推动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

2012年6月19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① Will Kymlicka,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p.2.

译者的话

“在要跨入近代的时候，商业化和贪污腐败、日益加剧的社会复杂性以及颓废堕落等，都是正在改变中国社会及其内部权力分配的力量。由于君主没有能力捍卫自己的统治使之免遭私人利益集团的侵害，中央政府本身在支配和规定公共利益范围时所能起的作用便受到了不可挽救的损害。”^①《剑桥中国晚清史》的编者在阐释晚清为什么会衰亡的时候，特别强调了清帝国在公共利益上的无能这一重要原因，也道出了政府，甚至是君主制政府在保障和规范公共利益时的重要职能与作用。是以解制型政府理论强调放松政府规制，使政府的活动更具有创造力、效率和效能。该理论主张强化高层决策者和行政文化在管理中的作用，赋予官僚机构更强的决策角色，强调公共利益通过束缚较少的政府来实现。但是，这一主张遭到包括公共选择理论在内的诸多学派的非难。他们认为，政府及其官僚都是自利的经济人，政府管制并不是为了追求公共利益，而且所谓公共利益的追求会妨碍个人自由的生发。

然而，公共利益一直以来被视为政治统治或者公共管理合法性的决定性要素，甚至是国家存在与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正当性理由。^② 远至斯多葛学派就主张人不应沉湎于自我私利的追求，而应更加关注整个社会。马可·奥

① [美]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8 页。

② 自由主义思想家把国家作为保卫个人权利，尤其是财产权与生命权的工具，是以此类国家为消极性国家，国家权力来自于明确的授权，非经列举即为民众保留，国家不可侵犯，否则民众可以提供革命的方式收回自己的授权。社会主义、共和主义等思想视国家为一种目的性存在，其本身和民众的生活价值存在同一性，是以此类国家为积极国家，国家保留权力原则普遍存在。

勒留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① 中世纪的阿奎那说：“如果一个自由人的社会是在为公众谋幸福的统治者的治理之下，这种政治就是正义的，是适合于自由人的，相反地，如果那个社会的一切设施服从于统治者的私人利益而不是服从于公共利益，这就是政治上的倒行逆施，也就不再是正义的了。”相应的，“当一个力求靠他的地位获得私利而置其所管辖的社会的幸福于不顾的人暗无天日地施政时，这样的统治者就叫暴君”。^② 霍布斯则直接提出，人们之所以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包括生命权，把它交给利维坦那是因为国家对全体签约者共同利益的承诺。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则说：使一个人不能为他的国家做任何事情，他也就不关心他的国家。是以对公共利益与社会福利而不是狭隘的私利的聚焦乃人之本性。

古典自由主义认为，正当的权利是独立于文化和历史条件的，具有一种作为普遍规范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超越国家与民族，根植于人类本性之中。他们主张，权利应被理解为有资格获得的东西，或者不能基于社会公共善、社会福利事业、公共利益或社会慈善而侵犯的领域。从权利本位出发，柏林视消极自由为绝对的价值，没有消极自由，其他的价值就无所依托。柏林的消极自由狂热被施特劳斯批评为一种专制主义。现代自由主义否认古典自由主义的权利天赋性和消极性，他们认为权利具有其内在的社会性，权利是由其他人提供的某些利益或服务所构成的，权利受制于社会习俗和法律制度。在此基础上，现代自由主义奠定了政府干预和社会福利政策理论的基础。

功利主义强调从常识出发，反思古典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功利主义强调社会或者集体利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功利主义反对建立在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公共利益推定，它所主张的公共利益更多地吸收经验主义的逻辑理路。功利主义主张公共政策的目标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the greatest good of the greatest number），所谓的公共利益或者公共善就是减缓最大多数人的痛苦、增加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而这种幸福超越了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个体效用，仅依赖于特殊自足个体的内心感觉，因为

① 参见[古罗马]马可·奥勒留：《沉思录》，何怀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②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6页。

人的社会性具有共同的内容与精神实质。为了实现每个人的平等自由，功利主义允许政府进行相应的政策和立法调节。在此基础上，功利主义认同现代政治的民主原则。功利主义主张通过民主的原则，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当然，在其边际上，功利主义内部存在一定的分歧。边沁的功利主义主张通过自由市场的方式促使社会生产的最大化，在此基础上通过平等分配来实现社会福利和人民幸福的最大化。边沁虽然主张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但是他也主张自利选择原则，他认为只有当事人自己才是幸福与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当事人完全可以选择在功利主义理论看来属于痛苦的“幸福”观。在此逻辑下，边沁主张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基于社会福利、公共利益的边沁功利主义。主张权利与责任相结合的密尔的自由主义功利主义，被视为是与古典自由主义的权利及自由概念无法相融的东西。密尔的思想也被认为是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之间不伦不类的杂交，虽然边沁功利主义的公共利益逻辑和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公共利益逻辑如出一辙，后者认为自由市场可以导致社会生产最大化，从而带来社会幸福指数最大化。密尔指出，道德感（moral sentiments）、智识上的愉悦（mental pleasures）、尊严（dignity）构成幸福的重要内容。密尔的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在批判边沁粗鄙功利主义的基础上，在强调他人和人类社会的幸福的基础上强化了个人基本权利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密尔倡导个人自由，主张个性独立。他的基本逻辑是，只有这样，才能够塑造一个奋发向上、公共利益和社会福祉不断发展的积极社会。

密尔认为，对公共利益的追求未必损害个体的幸福。代议制政府是密尔站在自由主义立场解决公共利益难题的一剂药方，也是现代共和主义者麦迪逊处理民主问题的一个方案。密尔认为自由竞争是必要的，但是政府在分配与社会福利问题上的责任也是不可忽视的。密尔认为自由不是无边无际的，由少数人组成的代议制政府是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自由的最佳形式。

人们有时会发现，政治辩论常常陷入在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这样的术语框架中。但是约翰·菲茨帕特里克认为，密尔的功利主义提供了第三条道路。个人自由是毋庸置疑的人类根本价值。在人类追求个人自由的路途中，个人自由毫无疑问会和公共利益发生矛盾与冲突。对于这一点，本书的作者约翰·菲茨帕特里克认为他找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对密尔思想的全面正

确解读。要全面正确的解读密尔思想，需要综合考量密尔《论自由》、《功利主义》、《代议制政府》、《逻辑方法》、《政治经济学原理》等作品间的逻辑关系和知识脉络。约翰·菲茨帕特里克认为，密尔在政治哲学的层面上，为人们平衡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找到了一条思路。本书是一部从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入手研究密尔思想的杰出之作。全书紧密围绕密尔的主要著作《论自由》、《功利主义》展开研究，全面而深刻地呈现出了密尔的政治思想，阐述了密尔政治哲学的独创性和复杂性。

约翰·菲茨帕特里克强调对密尔原著的阅读与分析。他反对把密尔解读为一位最大功利主义者。取而代之的是，他建议把密尔当作一位最小道德主义者，一位对个人自由十分忠诚，并且主张必要的权利保卫自由的最小道德主义者。至少在过去的50年里，许多哲学家认为存在截然相异的两个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一个存在于《论自由》之中，另一个存在于《功利主义》之中。他们认为，人们是无法把两个密尔协调起来的，因为自由主义的正义理念和功利主义是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从此种逻辑出发，他们认为，所谓自由功利主义，完全是一种矛盾修辞手法。在本书中，作者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解读方式。这种解读消解了《论自由》与《功利主义》之间的张力，推翻了自由功利主义不可能的论断。通过作者的解读，读者会发现，密尔相信人们在享受基本权利的同时完全可以承担功利主义的道德责任。密尔认识到人类存在的社会属性。他认为人类有义务相互帮助。但是他认为这项义务的实施应该是说服，而不是强迫。密尔在《论自由》中的目的非常清楚，一点都不含混，他就是要在个人自由和社会控制中取得一种平衡。

约翰·密尔（1806—1873），不仅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也是整个西方伟大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是一位对公共事务有着深远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密尔的年代，密尔在政治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产生的影响远大于他同时代的马克思。密尔的《论自由》被奉为自由主义的“圣经”，他本人也因而进入了自由主义理论大师的行列。他的《功利主义》，则被视作为公共利益申辩的经典之作。密尔背叛了他衷爱的自由吗？还是一如既往地在捍卫他在《论自由》中的立场？或者密尔根本就没有一以贯之的自由立场，甚至像他的某些批评者所批评的那样，他根本上就是个逻辑混乱者？不论人们对密尔的评价如何，《论

自由》与《功利主义》都毫无疑问地奠定了他在政治思想史上无可动摇的经典大师地位，而其著作间的巨大张力又让他备受争议，这些都使得向国内读者介绍这位现代政治思想家显得格外有价值。

借助严复和马君武的介绍，国人很早就对密尔的《论自由》有所理解。20世纪初严复就翻译出版了《群己权界论》（即《论自由》）。新中国成立后，又陆续翻译出版了《论自由》、《功利主义》、《代议制政府》、《密尔论民主与社会主义》（密尔遗著的残章）等密尔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但目前国内对密尔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人们主要集中在对《论自由》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他的自由主义思想，而对《功利主义》的研究相对不足，对《功利主义》与《论自由》两者关系的研究更是不够。按照约翰·菲茨帕特里克的观点，其实不仅是中国人，包括整个西方世界，人们对密尔的解读都是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近年来，中、西方学界对密尔政治哲学思想的复杂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密尔的研究有复兴的趋势，密尔思想中的“美德”因子、利他主义，对公共利益的考量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国内，2007年出版了唯一一部研究密尔思想的专著《密尔政治思想研究》（王连伟著，黑龙江大学出版社），但迄今为止，除了密尔的原著，尚未翻译出版一部西方大家研究密尔的专著。因此，译菲茨帕特里克2006年首版的《密尔的政治哲学》将填补国内的出版空白，并将十分有助于推进对密尔思想的完整认识和深入研究。

菲茨帕特里克目前就职于美国田纳西州大学，是著名的密尔研究专家。本书确立了菲茨帕特里克在学术思想界密尔研究权威的地位，2010年他又出版了《从密尔开始》。总体而言，本书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特点：

首先，本书立论公正客观，呈现了密尔思想的独创性和复杂性，是一部研究密尔思想的杰出之作。与其他一些密尔研究学者对其政治哲学格式化的处理不同，菲茨帕特里克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密尔归入“自由主义者”或者反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他通过对密尔的两部重要著作《论自由》、《功利主义》的研究，阐述了密尔政治哲学的独创性和复杂性。他认为，密尔的两部著作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张力，公共利益与个体自由之间是可以协调一致的。密尔是一个最小功利主义者，他的自由功利主义就是对个人自由的保障。

其次，全书逻辑清晰、论证有力，是一部理想的导读类著作。本书既是

一部专门的密尔政治哲学研究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导论性的著作。作者紧紧围绕密尔政治思想、政治制度设计的哲学基础——《论自由》与《功利主义》，细致地分析了其思想的特点。这十分有助于读者清楚地了解和把握密尔思想的逻辑理路。本书论证有力、通俗易懂，即适合国内一般读者，又契合专业研究者的需求。

本书的翻译出版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和鼓励。首先，要感谢的是大连理工大学的陈高华君、天津师范大学的刘训练君、人民出版社的钟金铃君，是他们为译者推荐了菲茨帕特里克这一著作，并推动了该作的翻译出版；其次，要感谢江西财经大学的李德满君，为本书译文的完善做了很多工作；最后，要感谢我的研究生许欢所做的注释完善工作。

本书诸多概念与句子的翻译，费心斟酌，可还是不够完善。由于译者学识浅陋，译文错漏谬误之处难免，真切希望得到各位同仁的批评指教。联系邮件：RDDNV@ALIYUN.COM。

万绍红

2013年8月于南昌

目 录

译者的话 / 1

导 论 / 1

第一章 功利主义及其权利 / 6

1. 詹姆士·瑞吉尔论功利主义 / 7
2. 猪猡式的功利主义 / 11
3. 功利主义与隐私权 / 13
4. 种族与性别正义 / 15
5. 康德的种族思想 / 16
6. 种族歧视及其盲目性 / 17
7. 密尔的种族思想 / 19
8. 康德论女人 / 23
9. 密尔与男女平权运动 / 25
10. 历史上的密尔与康德 / 25
11. 康德论动物 / 26
12. 康德与理性的限度 / 29
13. 边沁论动物 / 34
14. 边沁论鸡奸 / 35
15. 古典功利主义与权利 / 38
16. 功利主义、平等主义与平等对待权 / 42

第二章 功利主义、古典经济学与自由 / 50

1. 自由主义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 51
2. 密尔与政治经济学 / 55
3. 自由与个体发展 / 59
4. 伤害原则 / 61
5. 自由原则 / 62
6. 密尔的辩证法 / 63
7. 个性与表达自由 / 65
8. 生活体验的功用 / 67
9. 自由原则的最终模型 / 70

第三章 密尔的最小道德主义 / 75

1. 爱德华视界中的密尔 / 76
2. 澄清与说明 / 79
3. 哲学与时尚 / 80
4. 把密尔理解为最大功利主义者的困难 / 84
5. 作为最小功利主义者的密尔 / 85
6. 密尔与道德极端主义 / 87
7. 密尔的功利主义与《论自由》 / 91
8. 功利主义与系统逻辑 / 93
9. 功利原理 / 99
10. 功利和性格塑造 / 104

第四章 罗尔斯视角的质疑 / 109

1. 罗尔斯的异议 / 109
2. 边沁与权利 / 111
3. 灰色和绿色功利主义 / 114
4. 霍斯普视界中的两个密尔 / 118
5. 功利主义与惩罚无辜问题 / 119
6. 奴隶制度与个人权利 / 124